

《史记》《汉书》中匈奴民族观差异探析

孙淑琪

西南民族大学，四川省成都市，610225；

摘要：中国自古以来便是多民族国家，《史记》列传部分中针对民族书写有六篇，《汉书》将六篇民族史传合为三篇。本文以二书共有的《匈奴列传》为例，从民族史料的选择、编排体例以及用词用语等角度比较《史记》和《汉书》中对待匈奴这一民族的态度，进而总结出班马在多元民族视角下，对民族关系上不同的见解。

关键词：司马迁；班固；《匈奴列传》；民族史料；民族史观

DOI:10.69979/3041-0673.24.6.038

匈奴是我国北方地区重要的游牧民族，其历史由来甚久。《史记》是最早为这一民族立传的史书，其中记载了其先祖为夏后氏的子孙，名为淳维。《汉书》承袭司马迁对匈奴的记载，又增补了汉武帝以后的历史，更为完整地记录了自远古至西汉末年匈奴民族的历史。大量的民族史料的保留不仅对于研究匈奴民族史具有重要的意义，还表现出了班马二人在史料选择上的差异。这些差异反映了司马迁和班固在编纂史料时不同的民族史观。

1 史料来源

《汉书·艺文志》记载：“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1]，因此自汉初便开始积累丰富的文献资料，至武帝时期学术文化得已繁荣发展。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便有了诸多资料得以参考，张大可等人在其《史记研究集成》中对《史记》本事考校，所见古书即达106种。司马迁“蕪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2]，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辨别编排和整理。这些文献的收集为《史记》民族史料提供了基础。

《史记·匈奴列传》史料不仅基于汉初大量的文献搜集，也建立在丰富的档案资料上。其中涉及战争、封赏等内容便是司马迁掌握且整合大量的档案资料形成的。材料涉及的内容包括且不限于诏书、策、廷议记录、文书、军功簿等。《汉书·匈奴传》中收录了大量的诏书原文，例如文帝时期的《遣灌婴击匈奴诏》，《汉书》中载：“文帝下诏曰：‘今右贤王离其国，将众居河南地……毆侵上郡保塞蛮夷……’”^[3]在《史记·匈奴列传》亦概括了此事：“匈奴右贤王入居河南地，侵盗上郡葆塞蛮夷。”^[4]这些诏书在《史记》中经过一定的处理，记录于民族史传中。文书作为汉与四方交往的重要媒介，记载了诸多与匈奴等周边民族往来的事迹。例如《史记·匈奴列传》概述冒顿与高后文书往来，以“妄

言”二字体现出冒顿的嚣张，司马迁因避讳对此文仅简略记载，《汉书》将此文书进行了详载。此外，司马迁亦收录了文帝与单于的多封往来文书，相较于武帝时期以“天子”自称，文帝多以“皇帝”自称。这些细节足以表明武帝时期标榜汉在世界中心的地位。汉与匈奴往来不乏兵戎相见，军功簿亦被用于史料来源，其中包括战争的前期准备、兵马数量、战绩情况、军功封赏等情况。司马迁在叙述与周边民族的战争时便参考了其中的信息，多数选择了详尽且具体的记载，同时在运用这些材料时进行了一定文学化的处理，而非照搬。尤其是记载自高祖至武帝时期与匈奴的战争，都较为详细地记载了前因后果。实证资料也是司马迁在撰写民族列传中的重要材料来源。

西汉时期与周边民族交往甚密，使节、商人等之间的相互交流加深了各民族之间的了解。司马迁也探访了诸多历史古迹，采集民俗民谣，积累了大量实证因此，这些资料成为了史书撰写的重要基础。

综上所述，司马迁在民族史料的选择上综合了先秦文献、皇家所藏档案资料以及民族之间往来文书和田野调查、实物考证等资料，形成了对周边民族与汉民族关系的相对准确的认知，表现出了周边民族真实的历史面貌与生活状态。

《汉书》中民族史料的选择建立在《史记》的基础上，《汉书·匈奴传》分为上下篇，将《史记》中的民族史料部分多集中于上篇，并对史料进行了增补，包括诏书、奏议等内容。其中诏书的增加使得在史料上更为充分，例如增加了文帝时期令丞相灌婴出击匈奴的诏书，保存了相关史料的同时解释了汉对匈奴战争的原因，即匈奴族“捕杀吏卒，驱侵上郡”等野蛮入侵行为，除此之外还有八处增添。这些诏书的增添是班固经过审慎选择的结果，不仅表现出了当时汉匈之间往来的具体细节，也保存了诸多历史事件发生缘由。

2 编排体例差异

《史记》首创了为少数民族立传，丰富了周边民族的历史史料，纵观《史记》民族列传的编排，各民族列传穿插列于人物列传之中。其中《匈奴列传》为诸民族列传之首，将内容分为三个部分，其中包括匈奴族为夏后氏之苗裔及历史流变，生活习俗以及早期与中原华夏族的交流往来，以及汉匈之间的和亲与战争。《太史公自序》中讲述为匈奴族列传的原因是“自三代以来，匈奴常为中国患害，欲知强弱之时，设备征讨。”^[5]司马迁选择以史为鉴，为当下及之后与匈奴交往提供参考，但其并没有局限于两族之间的冲突，其中穿插着匈奴的习俗、管制制度、政治架构等民俗文化，体现了其“原始察终”的历史叙述原则。

在体裁上，《匈奴列传》采用了纪传体，以编年为主线，综合了本纪、世家、列传、书（志）的特点，形成了一个更为完整且严密的体系，是中国史学史第一人，后世对其在民族史书体例创制之功评价甚高。司马迁通过对人物的刻画来展示整个民族的特性与历史变迁。这样的体系更为详尽深入地记载了匈奴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以及与华夏族和后来的汉民族交流的整体脉络，这样的记载方式不仅使得列传中包含了更为丰富的内容，同时也展现了司马迁进步的民族观，即各民族同根同源皆为黄帝子孙。

《汉书·匈奴列传》同样位于民族列传中之首，但区别于司马迁，班固将民族列传集中列于传的最后，由此反映出内外之别，即“华夷之别”。《汉书》中虽沿用了《史记》对匈奴族的情况即“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但在《地理志》中做补充说明的部分则体现了其对民族关系上的认识，“蛮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6]在此思想支配下，班固提出了对汉匈之间的五次战争进行了记录，在其中表现了汉朝对匈奴战争的正义性，特别是在汉武帝时期的战争，强调了汉朝在战争中的正义性和匈奴对汉朝威胁的性质。班固的叙事在讲述军事冲突的基础上还通过按各皇帝时期分段的方式，将战争和政治事件的发生顺序呈现出来，使整个汉匈交往之间的脉络更加系统化，具有条理性。这种编排方式区别于《史记》较为文学性的叙述，呈现出一种更为严谨且结构化的历史叙述方式。

3 词汇选择的倾向性

《汉书·匈奴列传》在《史记·匈奴列传》的基础上对人名、地名、族名进行了一定的改动，大多是因为音译用字不一致而改，但也有部分改动使文意有了较大的变动。

《史记》多采用中性词语来描述匈奴，其中在提到匈奴的历史渊源、风俗习惯和政治制度时，倾向于描述匈奴是一个完整的有历时沿革的民族而非单纯的一个入侵汉族的外敌形象。开篇“夏后氏之苗裔也”便将匈奴族视为同源的民族，而非完全排除为异己的族群。这样的叙述词体现了司马迁对匈奴一族的尊重和理解，通篇旨在平等且客观地叙述匈奴的发展以及与中原历来的关系。在对战争的叙述中也并未采用贬低的词汇来描述战争双方，而是更多地关注事件本身。例如文中提到地名“焦获”一词，“申侯怒而与犬戎共攻杀周幽王于骊山之下，遂取周之焦获，而居于泾渭之间……”^[7]在《汉书》中该部分的描述则为“申侯怒而与犬戎共攻杀幽王于骊山之下，遂取周之地，鹵获而居于泾渭之间……”^[8]，其中“焦获”一词根据《尔雅·释地》的记载，为周时期的地名。“鹵获”替代地名“焦获”表现出班固认为犬戎“取周之地”这一行为实为野蛮的，是不合于情理之中的。这样的对于描述战争时所选用的词语的修改在《汉书·匈奴列传》中还有多处。

在叙述戎狄破逐周襄王入中国时，《史记》中记载：“侵盗暴虐中国”，用“暴虐”来形容当时戎狄对中国的入侵程度，表现出当时的以周襄王为代表的诸侯国在军事上并未达到强势的程度，而且是到了“中国疾之”，在作诗时便用了“薄伐玁狁，至於大原”这样的来记录当时相较于中国诸侯的戎狄的势力之强。《汉书》中班固选择删去“暴虐”一词，用“侵盗尤甚”来记载戎狄入侵中国这一历史事件，其未表现出中国当时与戎狄实力上的差距，同时也用“尤甚”一词来强调入侵中国这一行为的不正当性，同时也表现出班固贵中华攘夷狄的民族主义倾向。

在叙述汉武帝时期对匈奴的征伐时，将匈奴塑造为汉朝的主要外患，强调汉朝在战争中的正义性和道义上的胜利。《汉书》中记载匈奴入侵时“匈奴大人云中、定襄、五原、朔方，杀略数千人，败数二千石而去”^[9]，此处记载了四处地名。《史记》中相关的记载为“匈奴大人定襄、云中，杀略数千人，败数二千石而去”^[10]，则为两处地名。班固更为详尽地记录了匈奴与汉朝边疆交战地带和地理范围，表明他对汉朝拓边和边疆控制的重视。司马迁对汉武帝通过武力扩展疆土的政策持较为谨慎的态度，对拓边行为并没有特别的强调。在他的叙述中，对于汉朝扩张和治理边疆地区的描写较少，或隐含批判，认为这种动用武力的方式过于激烈。

相比之下班固更强调“拓边功绩”，并表现出浓厚的大民族主义情结。他详细记载了边疆的设置和争夺细节，目的在于彰显汉朝的强盛和征服周边民族的功业。

在班固时期，这些疆域已不在汉朝版图之内，但他仍详细记载这些内容，表现出其对汉朝历史功绩的尊崇和对民族大一统的认同。

相校之下，司马迁在描述匈奴一族时用词更为中立，且重点集中于陈述史实。《史记》中记载鞬侯单于初立为“且鞬侯单于既立，尽归汉使之不降者。”^[11]《汉书》的记载为“且鞬侯单于初立，恐汉袭之，尽归汉使之不降者。”^[12]班固在其中添加了“恐汉袭之”，是对单于内心活动的揣测，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出其对鞬侯单于的轻视，表现出其大民族主义立场。

在生活习俗上的记述用词亦可体现出二人差异。司马迁在记载汉孝文帝时期与匈奴的和亲的记述为：“后四岁，老上稽粥单于死，子军臣立为单于。既立，孝文皇帝复与匈奴和亲。而中行说复事之。”^[13]《汉书》中将“二中行说复事之”提到“汉复与匈奴和亲”之前。在《史记》记载中，孝文皇帝与匈奴和亲是因为匈奴单于更替，“而中行说复事之”暗示了这次和亲尊在这难以持久存在的潜因。而《汉书》中对整个事件做了修改，和亲的事件由中行说促成，仿佛他在匈奴的使命是促成汉匈和亲，这与中行说奔赴匈奴时的实际表现相悖。据《史记》记载，中行说在离开汉朝前曾愤恨地表示：“必我行也，为汉患者。”果然，他到匈奴后投降单于，不仅妨碍汉使的任务，还多次为匈奴出谋划策。例如，他建议单于增加对汉朝的物质要求，“教单于左右疏记汉增絮食物”；甚至让单于“遗汉书以尺二寸犊”，以此戏弄汉朝。这些行为清楚地表明，中行说并非在匈奴促成和亲，而是站在汉朝的对立面，助长匈奴的强硬态度。

《汉书》将“中行说复事之”提前，使其似乎在汉匈和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一改动不仅违背了原始史实，也与中行说的真实行动形成矛盾。这样调整也反映了班固在编纂《汉书》时，试图通过细节修改来强化汉朝的主导地位和威严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对历史事实的忠实性和客观性。

通过对《史记·匈奴列传》和《汉书·匈奴传》的对比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汉书·匈奴传》在转录《史记·匈奴列传》的史实的基础上对内容做了诸多改动。司马迁在《史记》中以客观的史实陈述为主，对事件的发展脉络和因果关系进行理性分析。他的叙述较少加入主观推测或情感色彩，更注重还原历史本身。这种方法突显了他中立、平实的史学态度。例如，司马迁在记录汉匈和亲时，仅提到和亲的背景与结果，而未揣测当事

人的心理活动。班固在《汉书》中则更加注重突出汉朝的主导地位和民族威严。他通过对原文的调整和增补，不仅丰富了叙事的层次，还试图强化汉朝在民族交往中的影响力。

总体而言，司马迁注重历史的真实性与多维性，而班固则倾向于通过叙事调整表达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大汉民族主义的立场。这种差异不仅反映了两位史学家的个人写作风格和价值取向，也与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司马迁生活在汉初政权稳固、对外政策尚在摸索的时期，更强调历史的教化意义；班固则身处东汉，民族关系已经成为汉朝稳定的重要议题，他的写作更具有政治服务的功能。

参考文献

- [1] (汉)班固. 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01): 3754—3755、3756、3751、3752—3753、3744.
- [2] 张大可. 史书研究集成[M]. 北京: 2005(01):135.
- [3] (汉)班固. 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01): 3754—3755、3756、3751、3752—3753、3744.
- [4] (汉)司马迁. 史记.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01):2892、2882、2896、2898—2901.
- [5] (汉)司马迁. 史记.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01):2892、2882、2896、2898—2901.
- [6] (汉)班固. 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01): 3754—3755、3756、3751、3752—3753、3744.
- [7] (汉)司马迁. 史记.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01):2892、2882、2896、2898—2901.
- [8] (汉)班固. 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01): 3754—3755、3756、3751、3752—3753、3744.
- [9] (汉)班固. 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01): 3754—3755、3756、3751、3752—3753、3744.
- [10] (汉)司马迁. 史记.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01):2892、2882、2896、2898—2901.
- [11] (汉)司马迁. 史记.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01):2892、2882、2896、2898—2901.
- [12] (汉)班固. 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01): 3754—3755、3756、3751、3752—3753、3744.
- [13] (汉)司马迁. 史记.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01):2892、2882、2896、2898—2901.

作者简介: 孙淑琪(1999—), 女, 河南焦作人, 西南民族大学2022级研究生, 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研究。